

陈益民
编著

七七事变

真相



**全部细节和线索，
拨开七七事变前后笼罩在华北上空的迷雾！**

卢沟桥事变爆发，缘由何在？张自忠留平是“逼宫”还是临危受命？

宋哲元不说硬话不做软事对不对？抗战初期蒋介石以何种态度参战？

日本全面侵华陷入持久战，后悔了吗？赵登禹、佟麟阁究竟是如何殉国的？

陈益民 编著

七七事变

真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七事变真相/ 陈益民编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214-17788-9

I. ①七… II. ①陈… III. ①七·七事变—研究
IV. ①K265.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5204 号

书 名 七七事变真相

编 著 者 陈益民

责 任 编 辑 张 凉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2.75 插页 4

字 数 54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7788-9

定 价 6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我们不只是要看到历史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要从那过程中获得启迪,激发思考,感悟出对现实与未来的借鉴。然而,在日本,对于 20 世纪 30—40 年代中日战争史的认识,却存在不同的态度。一些人否认当年日本侵略中国,将战争美化为所谓的“共存共荣”,是为中国谋求福祉,全然没有正确的历史观,没有对那场给中国,也给日本带来灾难的历史的深刻反省。这种拒绝接受历史经验教训,不愿以史为鉴的心态,注定了日本与东亚邻国很难达成相互的信任,极大地妨碍了彼此在当今的和平时代携手同行的实现。

在那样的历史观引导下,日本有人不时抛出种种价值观扭曲的论调,诸如:不能用现在的价值观来看待过去的战争;日本出兵中国不是侵略,是自卫行动,日本没有领土野心;大东亚战争是为亚洲人民脱离英美统治的“解放战争”,为亚洲独立起了作用;战争和殖民统治也有好的一面;战前和战中之事与战后出生者无关,后人没必要为有过错的先人谢罪,等等。尤为遗憾的是,某些日本的最高主政者(如过去的小泉纯一郎,现在的安倍晋三),亦基本认可这样的历史观。安倍在 2013 年 4 月 23 日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就曾说,“有关‘侵略’的定义,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国际上都尚无定论”(转引自[日]山田朗《日本如何面对历史》,李海译,人民出版社 2014 年 7 月版,第 24 页),而“侵略”一词无定论,当年的日本“侵华”岂不是值得商榷了?

由此可见,在日本,存在着无视历史事实和扭曲历史认知的势力,他们背离了 1995 年的村山富市谈话:“应该立足于过去的深刻反省,排除自以为是的国家主义,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促进国际协调,来推广和平的理念和民主主义。”这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国家与民族间的友好,将产生极大的阻碍作用。对此我们应毫不妥协地反对篡改日本侵略史实的行径,并加强对于日本战争加害责任的思考与追究,努力使正确的历史观不为涌动的暗流所淹没。

2 七七事变真相

探究历史史实,厘清历史真相,是揭穿日本右翼掀起的历史翻案风的重要途径。作为八年抗战起点的七七事变,在中日之间也存在许多争议,其中固然有学术性的,但也不可否认,有的争论在日方来说带有某些政治上的用意。本书正是出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目的,以大量历史资料为据,对七七事变做了全方位的探讨,辨别真伪,找寻真相,试图从事变这一个侧面,了解日本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战略及其失败的根源。让更多的人知道,历史事实终究是篡改不了的。

当然,对于七七事变的研究,国内学者之间,甚至许多事变当事人之间,也存在许多学术上的争议。同一个人物,存在不同评价;同一件事情,存在不同记述。这是一段重要的历史,是一段值得我们认真考证的历史,它不应该过于众说纷纭,应该产生较令人信服的定论。

本书广收各方史料,所要探讨的论题主要有以下六方面:

第一,中日战争爆发,责任在谁?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经过,早已是很清楚的历史事实。而有关事变的起因及其所导致的结果,仍存异议。一些日本学者,尤其是日本的右翼分子,往往从追究谁开的“第一枪”入手,认定这本是一个偶发事件,不是出于日方预谋;由此他们进而提出,是因中国军队的挑衅导致事态的扩大,中日战争的责任在中国一方。这种论点完全无视日本长期以来不断膨胀的侵华野心,甚至彻底否认了日方早有把通过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的模式复制到华北乃至全中国的企图。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让日本军方看到了以此为突破口侵占华北的机会。其实,无论卢沟桥事变本身是否为偶发事件,日军恣意挑衅以达到扩大侵华的阴谋是一贯的。因此,在日本逐步实施进一步的侵华计划从而使中日关系日益紧张的形势下,即使没有卢沟桥事变,也会有华北其他地方的中日军事冲突事件的发生。事实是日方一意寻衅挑起事端,中日战争最终不能避免,这完全是日本造成的结果。

第二,如何评价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在抗战初期所采取的应对策略?

对于蒋介石在抗战初期的抗战态度,世人素有种种看法。或认为一味求和,或认为和与战犹豫不决,或认为有条件地自卫抵抗,或认为“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后他才真正抗战。台湾一些学者则认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已认清这是日军入侵华北的前奏,因而决心应战。可见,对于蒋介石抗战初期的态度,及由此影

响到的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的处置,素来是众说纷纭的。

蒋介石对于日寇的野心洞察于心,他从卢沟桥事变中,深虑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他画了一条底线:如果丧土丧权,那么就只有拼死抗战了。然而,他也深知中日军事力量的差距,痛感中国国防尚未作好应战准备,与日开战,必然后果严重,于是他也一直努力寻求卢沟桥事变的和平解决。这种顾虑两端的結果,便是下定抗战决心,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的同时,却又备战不力,缺乏长远有效的抗战大战略。我们一方面应当承认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努力,客观上打破了日本短期内灭亡中国的幻梦,也为国家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内迁争取了时间。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的不足:一是过于注重阵地战,注重一城一地的得失,用有限的精锐部队与武器装备明显占优的日军硬拼,由此使国力遭受了严重损失;二是中央对华北局势缺乏有效管控,这是战前国民党中央在华北对日妥协以及中央与地方存在的固有矛盾造成的恶果,中央军要进入河北有百般顾忌,中央对冀察当局与日方的交涉了解有限等,都反映出中央鞭长莫及之弊;三是中央一面备战,一面又幻想与日和谈,犹豫徘徊就在所难免了;四是片面地依赖军队对日作战,而未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参与战争,无论是兵员补充、后勤保障、医疗救助,还是在更广阔的地域上开展人民战争,都有很大的欠缺。当然,即便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抗战初期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在维护主权领土上的坚定性,在抗战的决心上,还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如何评判事变爆发后宋哲元与日方的和谈?

对于宋哲元在七七事变前后的行为,向来颇多非议。有议论认为,宋哲元有军阀割据思想,在华北与日方勾勾搭搭,不认真准备抗敌,事变发生后又一味和谈,最后总算通电抗战了,又与敌一触即溃,致平津沦陷。

这样的指责固然有其道理,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宋哲元当时处境的艰难和他的努力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事变前后,因他与日方的软磨硬泡,使日方试图搞“华北自治”、脱离中央的阴谋破产。无论他与日方做了何种交涉,而在主权和领土的核心利益上,他并没有让步。在日军军力远强于中国军队的客观形势面前,他与蒋介石抱同样想法,“抗战而不求战”,也幻想和平解决,视卢沟桥事件为局部事件,对日寇的野心的认识有局限性,这影响到了二十九军的军事准备,以致后来在与日军进行的全面作战中,损失惨重。但无论如何,在日军发出最后通牒的危急时刻,他没有屈服,没有投降,毅然发出了抗战通电。这是不能不令我们

由衷敬佩的地方，称他为爱国将领实至名归。

第四，在日军围困北平之际，张自忠留北平，是对宋哲元“逼宫”还是“临危受命”？

张自忠在抗战中壮烈殉国，世人过去多避谈其在平津沦陷中的行为。即使言及，又往往称张自忠在日方发布最后通牒后，是临危受命，在宋哲元率军赴保定的危急时刻，奉命留在北平继续与日方折冲周旋，以致当时及后来总被人误为汉奸，代人受过。也有人认为，张自忠在1937年4—5月间就访问了日本，对日本的国力军力怀有畏惧心理，因而事变发生后，他一直主和，尤其是7月19日与日方秘密签订了《香月细目》，其中包括损害我方主权的条款；25日他又不打招呼就从天津来到北平，28日又逼宋哲元离平，由他来主持北平局面，随后在日军扶植下，北平就被汉奸所把持。

事实究竟如何呢？应当承认，张自忠确实是误入歧途，被日军和汉奸所误导。但称他“逼宫”，则似说得过头。因他对于日本国力强于中国有较深入了解，当时又与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多有来往，因而事变发生后，他深信自己有能力与日军达成和解。宋哲元开始也倾向于和谈，因而也多派他居中折冲。19日签订的《香月细目》的条款，宋哲元应当是知道的；25日张自忠来平，并非居心叵测，而是参加紧急会议。但日军发出最后通牒后，张自忠对时局的判断就大错特错了，他认为日本人不愿与宋哲元打交道，宋哲元造成了目前的危局，只要他离平，由张自忠自己出面与日军斡旋，就可以挽回局面。张自忠没有认识到日军的全面进攻是早有预谋，而非宋哲元处置不当造成的后果。待宋哲元赴保定，张自忠就在北平将原冀察政务委员会大举换人，造成汉奸主政局面，并将北平变成不设防的城市，开门纳敌。不过张自忠很快就发现上了鬼子的当，这才幡然悔悟，逃离北平，以后全力抗战，最终成为抗日烈士。

不能说张自忠有意堕落，只能说他对当时时局认识不足，不慎落入了与日方勾结的汉奸设置的圈套。

第五，日军在中国是“进入”还是“侵略”？

日本右翼势力不承认日本侵略中国，认为是“进入”中国，是为解放中国人民，使中国摆脱英美殖民主义统治，以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野心更加膨胀，普遍相信只要对中国发动战争，三个月内就可以使中国屈服。因此，借卢沟桥事件，大举增兵，扩大侵略，以期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大规模军事介入，控制华北的野心很快发展到要吞并全中国，并

在经济上大掠夺,推行殖民主义文化,完全是一种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对中华民族的殖民统治。

第六,七七事变后日军为何扩大侵华,又带来怎样的恶果?

日本右翼把战争的扩大化归咎于中国,认为是中国军队一再挑衅,恣意威胁日军及其侨民安全,使得事态不断扩大。而事实是,日方不断提出损害中国主权、占领中国土地的无理要求,只要中方拒绝,日方即以此为借口称中国无解决事变的诚意,而诉诸武力,并不断将武力扩大化。他们以为扩大战争,将很快使中国屈服,从而可以在中国进行殖民统治。

日军全面侵华,不仅带给中国巨大灾难,实际上也让日本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泥潭,从而走上了一条失败的道路。抗战两年后,日本深感当初全面侵华决策的失误,懊恨从一个可以在发生地解决的地方性事件,随意地扩大为全面的侵华,以致后来想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争,也因陷得太深而无法回头,只好硬着头皮打下去,直至最后战败投降。日本学者山田朗指出日本“战败的原因应该求之于近代日本的扩张主义政策、冒险主义战略以及缺乏预见性的战争导向”(《日本如何面对历史》,第4页),可谓一针见血。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最伟大的正义战争,这场战争胜利已过去70多年,在这样的时刻,重温过去的历史,可以观照未来的走向。当今日本安倍内阁的所作所为,使军国主义在日本有抬头的危险,不能不引起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警惕。历史教训不能忘记,日本侵华的历史必须成为警醒后人的警钟。日本政府修订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强化向海外派兵及武器出口、强化军备和军事演习,以及挑起岛屿争端、推行围堵中国战略、修改历史教科书、否定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政府阁僚祭拜供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预示着日本有可能走上过去的军国主义老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此书正有助于警示人们从日本过去的所作所为,警惕它今后恣意妄为的动向。

凡 例

一、本书主旨,在于广泛摘录各方文献,存文献原始面貌,引述所涉诸般异说,努力辨其伪,求其真,还原七七事变真相。

二、本书所称七七事变,指中日双方由最初的局部冲突,迅速发展到全面战争的过程,即从1937年7月7日夜我第二十九军与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在卢沟桥爆发冲突,到7月末战火升级,平津沦陷;再到察哈尔作战、淞沪抗战的蔓延,直至9月2日,日本正式将此次战争的“北支事变”(华北事变)之称改为“支那事变”(中国事变),标志中日全面战争的最终形成。

三、本书文献多摘自旧时电报、档案、新闻报道、回忆录、日记、书信,及一些权威的战史著作、研究专著,以抗战时期的原始材料及事变当事人的记述为主,适当择取后世研究者的论据。

四、较重要的文件档案和名人文稿有明显错字、漏字、衍字,以〔 〕标示正误;新闻报道、一般性回忆录中的错字,径改。但地名卢沟桥之“卢”、廊坊之“坊”,旧时文献常分别写作“芦”“房”,径改;民国时某些字用法与今不同,一般不改,如他(它)、那(哪)、连(联)系、澈(彻)底、发见(现)等;原始文献中之汉字数字不改阿拉伯数字,而编者解说文字中一般用阿拉伯数字,唯军队番号仍用汉字数字,军队所用英文字母代号亦保持原样,如A为军、D为师、B为旅等。

五、与七七事变相关的重要人物,在文献中第一次出现时予以注解,并且主要介绍其在当时的情况,一般未对其人生作全面述说。

六、全书文献以摘录为主,标题上不再注明“节录”;文献中间有句子或段落被删节者,标明“【中略】”,文献前、后之删节一般不标注,但删后有语义不完整者则标明“【上略】”“【下略】”。

2 七七事变真相

七、每段文献之标题除少数外，多为编者据其内容拟定。

八、凡文献有明确时间者在题下或解读文字中注明其年月日。

九、文献出处，民国书刊出版单位尽量标出版地点，如“桂林，前导书局”，1949年后大陆书刊出版单位一般不标出版地点，如“中华书局”不作“北京，中华书局”，而台湾的出版单位前标明“台湾”或“台北”。

目 录

第一章 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	1
一、事变爆发	4
二、冲突的缘由与责任	50
三、最初的交涉	84
第二章 妥协还是抗战?	107
——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抗战初期的举措	
一、蒋介石对日策略	110
二、朝野各方主张	132
三、外交努力	165
四、军事部署	176
第三章 和、战之间	191
——宋哲元及二十九军上层的徘徊	
一、宋哲元的犹豫与二十九军上层的分歧	196
二、关于张自忠留平的争议	258
三、二十九军的抗战精神	306
第四章 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	315
一、战争扩大派与不扩大派	317

2 七七事变真相

二、冲突升级	333
三、平津的最后一战	352
四、汉奸粉墨登场	405
五、亡国奴滋味	417

第五章 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

427

一、冀察抗战	430
二、华东战端继起	465
三、全面侵华，日军深陷泥淖	478

附录一 七七事变前后大事记

490

附录二 韵目代日表

504

主要参考书目

505

后记

510

第一章 七七事变：偶发事件 抑或图谋已久？

卢沟桥事变发生经过，早已是很清楚的历史事实。然而一些日本学者，尤其是日本的右翼分子，对于事变的起因及其所导致的结果，却仍持异议。他们往往由事变中谁开了“第一枪”入手，认定这是一个偶发事件，不是出于日方预谋；由此他们进而提出，是因中国军队的持续挑衅导致事态的扩大，中日战争的责任在中国一方。并且，还宣称是共产党挑拨二十九军与日军发生冲突。如右翼分子提出：“支那事变起源于卢沟桥事件。而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受到挑衅就主动发动进攻的不是日本，而是中了中国共产党阴谋的中华民国的军队。”（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大东亚战争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61页）

1937年7月7日夜，究竟哪一方在卢沟桥首先开了枪，这是一个很难说得清的悬案。是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进攻性的实弹演习，引起卢沟桥中国守军误解而开枪射击；还是日军有意向卢沟桥方向开枪，激起中国守军反击；或者是有人在中日两军中间放冷枪，从而致起衅端，这是众说纷纭、后世很难辨别的事情。而日方有人对于事件的发生，还有更离奇的揣测，那就是认为事变是由共产党地下组织或国民党蓝衣社为挑起中日冲突而制造的祸端。

有关共产党或国民党蓝衣社挑起争端的说法甚为荒诞。如说驻守宛平的二十九军旅长何基沣、营长金振忠后来都成了共产党员，是不是受了共产党指使而对日开枪？然而何、金二人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他们如何服从共产党的命令？又如说张克侠是共产党员，他鼓动了宛平守军抗敌，然而张克侠时任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尚不能直接插手前线指挥。宛平中国守军抗敌，完全是出于对日寇侵华的义愤，出于爱国的激情，绝非因受某方面鼓动而为之。还有人说刘少奇是做地下工作的，是他在中日两军之间烧火、放鞭炮、打冷枪，以挑起冲突。这更是无稽之谈。刘少奇当时已赴延安，根本不在现场。事实上，我们发现真正在两军之间

搞阴谋活动的,是当时在北平的日本特务,他们故意制造事端,力图扩大中日冲突。

传言很多,日本某些人为推卸历史责任,千方百计寻找各种为日方侵略辩护的理由。

然而无论如何,日方为了挑起事端而先开枪是可能的;退一万步说,即使是中国守军先开第一枪,有中国学者也很形象地指出:你到我家院子里来舞刀弄枪,图谋占我家园,相互打起来了,你能说冲突的责任,在于我先砍了第一刀吗?其实,无论事变的那个晚上是哪一方先开枪,都不会改变日方长期以来试图在华北制造新的事变的基本事实。事变当晚指挥日军与中国军队作战的车田口廉也后来也曾对人说:“我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后来事件进一步扩大,导致卢沟桥事变,终于发展成这次大东亚战争。”〔日〕小俣行男:《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太平洋战争》,周晓萌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页)指的就是他把最初的小冲突当成扩大战争的机会,肆意将事件双方引向更严重的对立。

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早已有之。当代日本史学家古川先生指出:“卢沟桥事变的背景之一是自甲午中日战争以来,日本一直采取欺侮、蔑视中国的态度。当时的旧中国经济落后、贫穷,国力衰弱,加之军阀混战,国内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使旧日本军侵华气焰日趋嚣张。背景之二是日本通过‘九一八’事变,事实上将‘满洲’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对于缺乏资源的日本来说,资源丰富、地域辽阔的中国东北地区被视为日本的生命线,因此日本煞费苦心拼命稳固其在伪满的既得利益。但是,连蒋介石也拒不接受日本关于承认‘满洲国’独立的要求,同时,从‘满洲’到华北各地掀起‘反满抗日’高潮。保住日本在‘满洲’的既得利益,是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的重要历史背景。”(引自孙文清《正视历史,才能赢得亚洲人民的信赖——访日本史学家古川万太郎先生》,载《中国青年报》1997年7月17日)

1927年出笼的“田中奏折”,是日本称霸的纲领性文件。奏折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称霸世界的野心,在此昭然若揭。而其后陆续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与伪满洲国建立、七七事变与全面侵华战争、推行所谓“大东亚秩序”与太平洋战争,无不是“田中奏折”计划的具体实践。因此,可以毫无疑义地说,七七事变,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

步伐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正是通过这一事件，日军揭开了由攻占华北到全面侵华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很快占领了中国东北，继而建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如此轻易就达到了侵略目的，给日本带来了疯狂的刺激，使日本误以为中国可欺，只要动用武力，中国便唾手可得，这从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方某些好战分子宣称两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中可见一斑。为了尽快把占领中国东北的模式复制到华北乃至全中国，日方先是不断在华北搞所谓“华北自治”，企图在华北建立起脱离中央政府的傀儡政权，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便是在河北建立的一个傀儡政权。

鉴于其“华北自治”阴谋进展迟缓，日方遂欲通过武力来达到目的。在七七事变爆发的前夕，东京朝野便盛传北平附近即将有大事发生。这可不是空穴来风，必有其在北平一带挑起事端的阴谋在酝酿。而这一事端究竟有什么内涵，将发生于北平的何处，当时对外人而言还是个谜。

1937年6月以后，日军不断在丰台至宛平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演习的科目主要是针对中国军队、攻占战略要地。丰台、宛平均是扼守津浦线、平汉线进入北平的交通要道，当时丰台已在日军控制之中；控制宛平，自然成了日军急于要拿下的下一个目标。因而日军便频频在卢沟桥附近大搞夺桥和夺城的实战演习。其行动目的性如此明确，追究导致卢沟桥事变爆发的责任，日军如何脱得了干系？

把自己一方的侵略行为归咎于被侵略的一方，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伎俩。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即发表声明，称“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日本入侵中国，中国抗日，本来就无可指摘，而日方非但指责，还别有用心地捏造事实，称中国方面是有计划地挑起了冲突，这完全是贼喊捉贼的行径。连真正挑起事端的牟田口廉也在其《华北作战史要》回忆录（藏于日本防卫研究所）中，都承认“此次事件绝非支那方面有计划的行为，完全是卢沟桥附近局部地区的突发事件”。可见，日本政府是要借这一突发事件实施其长期以来武力占领华北的计划。真正早有觊觎华北的计划和构想的，正是日本本身！

某些人完全无视日本长期以来不断膨胀的侵华野心，总试图从所谓谁开第一枪来推脱日方的历史责任。而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历史事实也是不可能被颠倒黑白的。连日方当事人的证言，也早已告诉了我们历史的真相：事变发生时任

日本参谋长的桥本群,在1939年就曾这样说:“也许卢沟桥事件是能够避免的。但第二、第三个同样的事件,即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导火线一类的小事件,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见〔日〕岛田正彦等编《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东京美铃书房1978年版,第334页)换句话说,就是战争是在卢沟桥发生,还是在华北别的什么地方发生,固然有一定偶然性;但战争发生的本身,则是必然的,是日方当时必然要迈出的侵华步骤中的重要一步。因此,用所谓卢沟桥冲突是偶然事件来否定日方是有预谋的侵华,是站不住脚的。

一、事变爆发

1. 日方有关事变爆发的记录

清水节郎笔记^[1]

昭和十二年^[2]七月七日下午,第八中队为了进行夜间演习,从丰台兵营出发,开向卢沟桥西北约一千米的龙王庙^[3]。

当晚演习的题目是“黄昏时接近敌主要阵地与拂晓时的攻击”。预定从龙王庙附近的永定河堤,向大瓦窑进行演习。

下午四时半左右,去演习地看了一下。河堤上有二百名以上的中国兵,穿着白衬衣正在努力构筑工事。【中略】开始演习的预定时刻过去了。过了下午六时,他们的工作不像有停止的样子。

于是,我集合士兵,就平常所教育的关于我军对中国军方面的注意事项,提出具体问题来问了一下,以唤起注意;以后,改变了预定计划,从河堤的这一边大约一百米,背着河堤,配置部队,进行演习。薄暮时分,指挥官和其他有特殊任务的人,开始到前面活动,一般部队在天完全黑了以后,向前方二百米一线的假想敌移动。这时,一面命令身旁的指挥班长,一面自己也留着神,观察中国军的行动。他们即使干完了工作,也没有显出回兵营去的模样。

这天晚上,完全无风,天空晴朗而没有月亮,星空下面,仅仅可以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卢沟桥^[4]的城墙,和旁边移动着的士兵的姿态,是个静悄悄的黑夜。

晚上十时半左右,前一阶段的训练完毕了,为了休息到次晨黎明时为止,我叫传令兵对各个小队长假想敌司令传达了演习中止和集合的命令。一吹军

号，是可以迅速集合起来的，可是中队为了训练的必要，已经习惯于晚上尽量不用军号了。

我站起来看了一下集合的情况，骤然间假想敌的轻机关枪开始射击起来^[5]。我以为是那边的部队不知道演习已经中止，看到传令兵而射击起来了。这时，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

可是，我方的假想敌，好像对此还没有注意到，仍然继续进行着空弹射击。于是，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了十几发子弹。回顾前后，看到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似乎打什么信号）。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合起来的小队作好应战准备的时候，听到了一名士兵行踪不明的报告，就一面立即开始搜索，一面向在丰台的大队长报告这种情况，等待指示。

失踪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了^[6]。我命令传令兵，向大队长报告，对于中队以后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作了种种考虑，下不了决心。可是，等到好像在东北方的高粱地里出现了怪火^[7]，终于决意撤离当地，向西五里店移动，子夜一时左右到达那里，待机而动。到达后不久，大队代理副官龟中尉就来了，由于他的联系，知道大队主力已经出动^[8]，以后就归带领大队先头部队的一木^[9]大队长指挥。

在此之前，知道大队长从丰台用电话报告了在北平的联队长，接到命令：“作好准备后，把卢沟桥的营长喊出来，进行谈判。”接着，依照大队的命令，以占领一文字山^[10]为目的，派负责侦察的军官潜入一文字山。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东京原书房 1961 年版，第 164—167 页

解读

[1] 清水节郎，时任侵华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中队长，大尉军衔。正是他所率中队以卢沟桥为假想进攻目标进行的演习，引发了事变。这段笔记表明，由于日军持续在卢沟桥一带以夺取卢沟桥为目标进行军事演习，对中方构成重大威胁，已引起中国驻军高度警惕，中国军队也在做着必要的防备。日方不断做出进攻势态，中方时时严加防范，双方剑拔弩张，冲突的发生，只是时间的迟早问题了。

[2] 即 1937 年。

[3] 亦称回龙庙。

[4] 这里指二十九军驻守的宛平县城。